

投资绿色复苏

新冠疫情只是迫在眉睫的气候危机的一个前奏

乌尔里希·沃尔茨

这场危机是一场破裂，一个极度混乱的时刻。与欧美各国感受最直接的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相比，新冠疫情更加严重，它几乎影响到了全人类。在各国，无论发达还是欠发达国家，新冠疫情危机不仅暴露了卫生和社会体系的脆弱性，也暴露出我们经济的脆弱性。它还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凸显出加强防灾准备的必要性。危机结束之后，当我们重建经济和社会时，增强韧性需要成为重建的主要指导原则之一。我们需要确保有更充分的准备来抵御未来的大流行病，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努力应对人类的另一个重大威胁——气候变化。

长期以来，科学家们始终提醒人类暴发疫情的风险，曾发出大量警告，但世界对这场危机却毫无准备。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在气候变化方面

也是一样准备不足。和大流行的情况一样，科学家们长期以来一直在为气候危机敲响警钟。气候变化已经发生，而且在不断加速，这一点毫无疑问。最近在澳大利亚和美国加利福尼亚发生的野火，北极永久冻土的融化，以及风暴、洪水、干旱和其他与气候相关的自然灾害在数量和强度上的增加，都指向一个已经出现的问题。地球将很快超过气候临界点，并将为生命带来不可逆转的真正威胁。

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的说法，在新冠疫情袭击我们之时，我们还有大约十年的时间来实现低碳转型，并将世界经济带向将全球变暖控制在比工业化之前的水平高1.5摄氏度的轨道。未来几年将是我们避免灾难



性全球变暖的最后机会。我们必须将各种危机应对措施转化为变革性的政策响应。各种旨在保护就业和促进经济复苏的短期危机应对措施需要与旨在减缓气候变化和增强气候变化适应力及韧性的长期战略目标结合起来。我们需要尽可能利用经济刺激和复苏措施来增强我们的韧性，并实现合理转型。正如 IMF 总裁克里斯塔莉娜·格奥尔基耶娃所言，现在到了“要么恢复，要么失去”《巴黎协定》的时候。

推动可持续投资

在可持续复苏和经济进步二者之间并不存在权衡与取舍。许多绿色技术已经成熟，在大多数情况下，低碳能源已经比化石燃料能源更便宜。最近的证据表明，与传统的财政刺激相比，经过

合理设计的绿色项目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并为每一美元的支出带来更高的短期回报。此外，当前在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方面的投资已经产生长期且可观的回报，并已实现成本节约，而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无作为或行动迟缓则会付出很高的代价。我们现在采取的旨在减缓气候变化的措施代表着一种投资，它将在未来产生收益，而若继续不作为，则将导致灾难性的全球变暖，届时人类需要付出更高的成本。同样，如果未能进行相关投资，增强经济和社会的抗气候变化能力，则会损害我们未来的增长潜力和福祉。根据全球气候适应委员会的计算，在气候适应能力建设上每投入1美元，就可以带来2—10美元的净经济效益。

但是，一个主要问题是：许多国家缺乏实现经济复苏所需的资金和资源，也无力提供所需的

新冠疫情表明，一场自然灾害可以多么迅速地使我们的经济陷入崩溃。

投资去适应和缓解气候变化。新冠疫情危机极大地恶化了公共财政，而许多国家的财政状况在当前的危机暴发之前便已经岌岌可危。IMF 预计，今年全球公共债务将增长至全球 GDP 的 100% 以上，同比增长 19 个百分点。放眼今后，许多国家将需要债务减免，以有效应对当前疫情危机，并对其经济进行有意义的投资以应对气候变化。目前，国际金融架构仍缺乏一个适当的体系来应对主权债务不可持续的情况。必须找到合适的方法系统地解决发展中经济体即将到来的债务危机。

此外，在公共财政捉襟见肘的情况下，各国有必要对各项公共支出以及税收体系进行调整，以使其符合减缓气候变化的相关要求，这一点至关重要。这其中应包括逐步取消所有化石燃料补贴。根据 IMF 的估计，2017 年全球化石燃料补贴为 5.2 万亿美元，占全球 GDP 的 6.5%。取消这些补贴不仅可以节省大量公共开支，也将有助于减少排放。此外，如 IMF 2019 年 10 月的《财政监测报告》所示，有实质意义的碳税（IMF 建议每吨二氧化碳征收 75 美元）可以成为一种十分有力的环境工具，能在减少碳排放的同时产生许多额外的环境收益，包括降低因空气污染导致的死亡率。各国可以将碳税收入进行重新分配，以支持低收入家庭或社区；由于向低碳经济转型或由于气候变化产生的实际影响，这类家庭或社区受到的冲击将尤为严重。目前相对较低的油价水平为各国政府提供一个很好的机会，使其可以在政治成本较低的情况下征收或增加碳税。

调整金融措施

除财政政策之外，还必须按照《巴黎协定》第 2.1c 条的规定，将资金流动与旨在实现低温室气体排放和抵御气候变化发展的途径相结合。为此，货币和金融主管部门需要将气候风险充分纳入其审慎和货币框架。在过去几年里，越来越多

国家的央行和金融监管机构认识到，气候变化无论对单个金融机构还是系统性金融稳定均构成重大风险。2017 年 12 月，8 家央行和监管机构组建成立了“央行与监管机构绿色金融网络”（NGFS）。如今，该组织已发展至 66 家央行和监管机构。在其发布的一些报告中，NGFS 着重强调了气候变化对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的影响。当务之急是，货币和金融主管部门应迅速采取行动，落实与应对气候风险有关的综合性框架。这类框架应强制要求向整个金融部门披露气候风险和其他可持续性风险，以帮助从业者更好地进行风险分析；应要求金融机构定期进行气候压力测试，其中须考虑多种过渡情景；此外还应将气候相关金融风险纳入审慎监管。

重要的是，各国央行和监管机构也应当调整当前的危机应对措施，以避免在实现金融稳定的同时陷入高碳型经济复苏（Dikau, Robins, and Volz 2020）。那些旨在增强流动性的刺激措施如果不符合《巴黎协定》的原则，可能会极大地加剧金融机构投资组合和整个金融体系中与气候相关的风险的积累。此外，在不考虑气候风险的情况下放松反周期工具和其他审慎工具可能会进一步增加此类风险。因此，不应推迟实施各种涉及气候风险的审慎工具，而应加快其实施进度，以尽量减少投资组合中额外风险的潜在积累。

支持脆弱国家

许多国际金融机构已成为 NGFS 的观察员，并积极帮助成员国调整金融体系以使其符合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它们在这个框架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包括支持成员国的能力建设，在很多问题上它们以身作则，比如带头将气候风险纳入其自身的各项政策，并在制定相关最佳实践方面发挥模范作用。对多边开发银行来说，这还意味着需要根据《巴黎协定》调整自己的投资组合，并彻

底淘汰所有的高碳贷款和投资。在目前的危机形势下，多边开发银行和各国国家开发银行也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为有需要的国家提供逆周期贷款，这既能在短期内促进经济复苏和就业，同时也可以促进向更可持续的低碳经济转型。

国际金融机构也应加大对那些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国家的支力度。一个令人悲哀的事实是，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是那些最不当为人类工农业活动造成的全球变暖承担责任的。对这些国家来说，迅速加大相关投资以提高自身对气候的适应能力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不幸的是，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发展中经济体在财政方面面临最多困难，无力为适应气候变化和增强韧性提供充足的资金。这些经济体尤其容易受到与气候相关的金融风险的影响，其政府和企业都已经面临着资本成本的气候风险溢价 (Kling and others 2020; Beirne, Renzhi, Volz 2020)。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发展中经济体面临的切实危险是，它们将进入一种恶性循环，即国家越易受气候影响，其债务成本越高，对气候适应能力进行投资的财政空间也越小。

这些国家的金融风险目前已经很高，而随着金融市场对气候风险的定价越来越高以及全球变暖加速，这一风险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加 (Buhr and others 2018)。迫切需要国际社会为它们提供资金支持，帮助其增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并建设金融风险转移机制，以尽可能帮助这些国家进入一个良性循环。加大抗风险能力融资既有助于改善其脆弱性也可降低其债务成本，从而为这些国家提供额外的空间来扩大投资规模以应对气候挑战。

IMF 和多边开发银行也需要开发新的工具，包括拓展应急便利安排，以便在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发展中经济体遭受灾害时为其提供支持。在过去的 20 年里，大约有 20 个国家 (其中大多数是小岛屿国家) 遭受了超过其 GDP 10% 的损失。最极端的例子是多米尼加，2017 年飓风玛丽亚给该国造成的损失估计相当于其 GDP 的 260%。2004 年，飓风伊凡给格林纳达带来约等于其 GDP 150% 的损失。但是，即使在不那么极端的

情况下，灾难也可能对公共财政造成严重破坏，并使主权债务变得不可持续。我们迫切需要讨论如何处理气候债务，也就是说，由气候灾害或必要的适应性措施直接导致的公共债务。

避免永久危机模式

新冠疫情表明，一场自然灾害可以多么迅速地使我们的经济陷入崩溃。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国家长期以来一直面临这种风险。如果我们现在不采取共同行动，加强投资力度以缓解并适应气候变化，那么更多的国家将处于永久性危机模式。届时，为数不多的受影响较小的国家也将无法保护自己免受其他国家问题的影响。正如新冠疫情已跨国传播一样，气候变化的影响也将波及全世界，尤其是在灾害和气候变化背景下，全球移民的人数也将增加。

气候变化事关重大。我们有 10 年的时间来改造全球经济，避免灾难性的全球变暖。我们需要在地方、国家和国际各个层面以及所有部门 (公共和私人) 做出集体努力，以应对气候变化，并让我们的社会和经济拥有更强大的韧性。我们面临的挑战十分巨大，但这场危机也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们重新思考我们的经济和社会。正如 IMF 总裁克里斯塔莉娜·格奥尔基耶娃所言，我们有责任“选择我们想要的复苏方式”。我们最好作出明智的选择。FD

乌尔里希·沃尔茨 (ULRICH VOLZ) 是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可持续金融中心主任、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经济学讲师、德国发展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参考文献：

Beirne, J., N. Renzhi, and U. Volz. 2020. "Feeling the Heat: Climate Risks and the Cost of Sovereign Borrowing." ADBI Working Paper 1160, Asian Development Bank Institute, Tokyo.

Buhr, B., U. Volz, C. Donovan, G. Kling, Y. Lo, V. Murinde, and N. Pullin. 2018. *Climate Change and the Cost of Capital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London: UN Environment, Imperial College London, and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Dikau, S., N. Robins, and U. Volz. 2020. "A Toolbox for Sustainable Crisis Response Measures for Central Banks and Supervisors." Grantham Research Institute on Climate Change and the Environment,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and SOAS Centre for Sustainable Finance,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Kling, G., U. Volz, V. Murinde, and S. Ayas. 2020. "The Impact of Climate Vulnerability on Firms' Cost of Capital and Access to Finance." *World Development*, forthcoming.